

广西和越南史前贝丘遗址的对比研究^{*}

◆ 彭长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与人类学研究所)

◆ 胡章华

(南宁市博物馆)

摘要: 广西和越南的史前贝丘遗址可分为洞穴、河岸、海滨三种类型,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时空特点;通过对两地贝丘遗址演进过程、生业模式和丧葬习俗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二者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其成因既与生态环境有关,也与文化交流和人口迁移有关。

关键词: 广西;越南;贝丘遗址;异同;成因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 The prehistoric shell middens in Guangxi and Vietna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cave, riverbank and seashore, each of which has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living mode and funeral custom of the sites in those two area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y have strong similarities, but also some differences, whose causes are related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xchang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Keywords: Guangxi; Vietnam; shell middens;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cause

广西和越南山水相连,贝丘遗址数量都较多,构成了两地史前文化的重要内容。两国学者对各自贝丘遗址的研究不少,但基本集中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上,对贝丘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发展演变的宏观分析较少。而且除少量论文略有涉及外,尚未有专文对两地贝丘遗址进行过对比分析。因此,本文拟通过时空分布的梳理,将二者的演进过程、生业模式、丧葬习俗等内容进行横向比较,探讨它们出现异同的成因,以便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两地史前贝丘遗址的完整情况和相互关系。

一、广西贝丘遗址的分类与分期

广西贝丘遗址的数量,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

共有86处^①。此后各地又有不少新遗址发现,数量大大增加。比如桂林谷地洞穴贝丘遗址数量,蒋廷瑜统计只有14处,至2010年韦军统计的71处洞穴遗址中60处以上有贝类堆积^②;柳州、柳江、来宾一带蒋廷瑜统计有7处,此后又有多处新点发现,并在都安、武宣等地也有新点发现,总数已达30余处^③;崇左、南宁一带近年来也有不少新点发现,从20处左右增加到40多处。据目前统计的数字可知,广西发现的贝丘遗址总数约为200处。不过,由于历年的破坏,只有少数遗址保存尚可,绝大多数已遭到破坏,部分只有少量遗存保留,有的被彻底损毁。最近二十年来经过发掘的遗址数量也有十余处,这使我们对其内涵了解更为清晰。

按照何乃汉的分类,广西贝丘遗址可分为洞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大陆的史前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20BKG006)资助。

穴、河旁台地、海滨三种类型^④，其中洞穴型数量最多，约150处，河旁台地型（一般称为河岸型，以下同）近40处，海滨型只有12处。洞穴型一般位于石灰岩孤山洞穴，面积多为100~400平方米，洞口高出山脚5~30米。全区各地都有发现，以桂林谷地、柳州和来宾所在的桂中盆地最为集中；南宁、崇左的桂西南左、右江和邕江沿线也有不少发现。桂林谷地绝大多数洞穴遗址都属贝丘遗址，除部分单独分布外，不少为6~8处一组成群分布，如甑皮岩、大岩、庙岩遗址群^⑤。桂中盆地遗址大多分布相对分散，也有部分如柳州都乐洞为3~5处一组成群分布。桂西南遗址基本沿江呈散点状，与河岸型交错分布。河岸型主要分布在左、右江及其下游的邕江、郁江、黔江沿线一级阶地上，位于河流拐弯处或大小河流交汇处，前临江后靠山，一般高出河面8~20米，面积多为500~5000平方米，少数达数万平方米。以南宁、邕宁为中心的邕江流域最为集中，约有十多处，其他或两三处一组或单独分布。海滨型分布在北部湾沿岸的山岗或小岛上，位于近海或河流入海交汇处，高出海面约10米，面积多为2000~5000平方米，最小的仅100平方米，最大的超过20000平方米，有的两三处一组成群分布，其他单独散布。

三类贝丘遗址出现的时代各有不同：洞穴型最早，河岸型其次，海滨型最晚；延续时间的长短和结束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三者存在的时间有重叠。

（一）洞穴型

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旧石器时代末期，距今26000—20000年，主要见于桂林、柳州一带，遗址数量较少，以临桂大岩一期、柳州白莲洞二期、鲤鱼嘴一期为代表。文化层中含少量螺壳，细小石器数量较多，单面加工的大型砾石石器较此前增多，出现可用来砸破螺壳的敲砸器。

第二阶段：中石器时代，距今20000—12000年，分布地域大大扩大，不仅在广西各地发现，在

邻近省区如广东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英德牛栏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等均有类似遗存发现，遗址数量显著增加，以临桂大岩二期、桂林东岩、轿子岩、释加岩、柳州白莲洞三期、鲤鱼嘴二期、陈家岩、来宾盖头洞、武鸣矮洞为代表。螺壳数量显著增加，石器以大型砾石打制石器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细小石器，开始出现磨制石器、穿孔石器、蚌器及最初的原始陶器。

第三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2000—8000年，各地均有发现，遗址数量最多，以临桂大岩三和四期、太平岩早期、桂林甑皮岩一~四期、庙岩、柳州白莲洞四期、鲤鱼嘴三期为代表。螺壳数量最丰富；打制石器仍然存在，但数量明显减少，磨制石器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大多仅磨刃；陶器制作技术进步，均为夹砂陶，以圜底器为主。

第四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8000—6000年，遗址数量显著减少，以临桂大岩五期、太平岩晚期、桂林甑皮岩五期、白竹境斋公岩、大岩口、柳州白莲洞五期、鲤鱼嘴四期为代表。螺壳数量明显减少；打制石器数量不多，磨制石器制作精致，大多通体磨光；陶器数量较多，出现泥质陶，器形种类大大增加，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变化。

第五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000—4000年，遗址数量少，分布零散，桂东北已消失，桂中有少量残余，而多见于桂南，以都安雷山、龙州宝剑山A洞早期、无名山岩厦为代表。因分布地域与此前不同，文化特征有较大差异。螺壳数量较多；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制作精细；蚌器数量较多；陶器数量少且制作粗糙。

第六阶段：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距今4000—2500年，只在桂西南、桂西北有零星发现，属先秦岩洞葬文化系统，以龙州宝剑山A洞晚期、那坡感驮岩第二期为代表。螺壳数量较少；石器均磨制精美；蚌器数量较多；陶器发达，数量、种类均较多。

（二）河岸型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延续至新石器

时代晚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8000—6000年，是这类遗存分布最广泛、遗址数量最多的时期，大多属于顶蛳山文化，以象州南沙湾、横县秋江早期、西津、江口、南宁豹子头、灰窑田、邕宁顶蛳山二和三期、牛栏石、长塘、凌屋、那北嘴、百色百达晚期、隆安鲤鱼坡、扶绥敢造一期、江西岸一和二期、龙州舍巴一和二期为代表。螺壳数量丰富；石器磨制规整；穿孔蚌器特色鲜明；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单一，多为圜底釜（罐）。

第二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000—4000年，遗址数量和分布区域均较此前大大缩减，基本集中在左江沿岸，以龙州敢造二期、江西岸三期、崇左冲塘、河村、江边为代表。螺壳数量仍较丰富；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数量不多，但有通体磨光的精致石器，研磨器数量不少，颇具特色；陶器数量很少，是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特征。

（三）海滨型

数量较少，内涵相差不大，时代也基本一致，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际，距今6000年左右，以防城港亚菩山、马兰咀、杯较墩、钦州芭蕉墩为代表。蚝、螺、蚌、牡蛎等海生咸水贝壳数量丰富；石器多为粗大厚重的打制石器，以螳螂啄、手斧状石器最为典型，磨制石器数量少，磨制粗糙；陶器均为夹粗砂陶，制作简单粗糙。

二、越南贝丘遗址的分类与分期

越南贝丘遗址绝大多数位于北部山区和沿海，只有少量分布于中部沿海。数量较多，分布密集。经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越南贝丘遗址的内涵和发展演变过程较为清晰^⑥。

越南贝丘遗址与广西基本一致，也可分为洞穴型、河岸型和海滨型三类。洞穴型数量最多，基本位于环红河平原的越北山区，分布相当密集，北中部沿海也有少量分布。遗址总数在300处左右，时空分布不均匀。时代最早的山韦文化，270多处遗址中仅有10多处洞穴遗址发现少量贝丘堆积。

和平文化数量最多，170多处遗址中绝大多数为含螺壳堆积的洞穴、岩厦遗址，以和平、清化两省最为集中，一般3~10处为一群，占据一到数个喀斯特山间盆地。东北山区的北山文化—前枚坡文化一枚坡文化有80多处成群分布的洞穴型。东北沿海较早的推孺类型30多处遗址也都有螺壳堆积，但其后的丐萍类型和下龙文化则很少见，其他如多笔文化、河江文化、泡卓文化等也有少量洞穴型。洞穴大多高出平地5米至20米，面积多在150平方米以下。河岸型数量很少，仅在北中部沿海的多笔文化中有4处，距海数十千米，面积在一两千平方米，文化层主要为贝类堆积。海滨型共有近50处，以北中部沿海数量最多，琼文文化都为贝丘遗址，泡卓文化也有部分贝丘遗址，北部沿海的下龙文化、长泾类型、蛮泊类型各有数处贝丘遗址，中部沿海的洲村文化均为贝丘遗址。有的遗址距海数千米，有的则靠近海岸线，也有的坐落在近海小岛上。一般位于土丘或沙丘上，高出海平面数米。遗址面积大小不一，多为一两千平方米，个别在一万平方米以上，贝类数量巨大，有的贝类堆积文化层厚达5、6米。

（一）洞穴型

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旧石器时代末期，距今30000—18000年，仅在山韦文化早期的少数洞穴遗址中出现，以太原仰岩厦第二文化层、奠边沈姜岩厦下层、清化条岩厦中期前段、水岩厦下层、英涂洞下层为代表。螺壳数量不多，以山螺居多，有少量河螺；石器多为打制简单的砍砸器、尖状器等大型石器。

第二阶段：中石器时代，距今18000—12000年，遗址数量增多，分布地域更大，在环红河平原的越北山区各地都有发现，南边扩大到北中部地区，以推孺类型早期的广宁天龙洞、迷宫洞，山韦文化晚期的太原仰岩厦第三文化层、山罗荒洞Ⅰ、和平寨村洞下层、清化昆蒙洞早期、条岩厦中期后段、没山洞、广治蝙蝠洞Ⅰ早期为代表。螺壳数

量增多,山螺和河螺数量相当;石器形体变小,打制精致,以山韦文化典型器类如柑瓣形器、多边砍砸器、1/4圆砾器等为主,也有部分和平文化特征石器。

第三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2000—8000年,是贝丘遗址最发达的时期,洞穴遗址基本都有贝类堆积,分布区域与此前相似,但遗址数量大大增加,遗址密度很高,以推孺类型中期的广宁仙翁洞、蒲国洞,北山文化早期的谅山沈扩洞下层、蝙蝠洞第2层、同束洞下层、庄村洞下层,和平文化早期的奠边沈姜岩厦中层、和平洞干洞、快洞下层、安良岩厦、宁平媒洞早期前段、好翁岩厦上层、桩平3洞、清化昆蒙洞中期、条岩厦晚期、茫钲洞早期、义安沈灰洞、寺洞、铜张洞早期为代表。螺壳数量很多,以河螺为主;石器种类、器型、功能更完善,以和平文化典型特征的杏仁形器、短斧、苏门答腊石器等和北山文化的大石片石器最具特色;出现磨刃石器和粗陶。

第四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8000—6000年,分布区域、遗址数量与此前相似,以推孺类型晚期的广宁河笼洞、蝙蝠洞、吉婆岛盎伧洞、腰符洞,北山文化晚期的谅山钳村岩厦下层、沈扩洞上层、明隶洞下层、高平仰排洞、太原刻俭洞下层,和平文化晚期的奠边沈姜岩厦上层、和平蚕洞、寨村洞、扶卫洞、快洞上层、宁平媒洞早期后段、黄岩厦早期、螺蛳洞早期、桩平1洞和4洞、清化昆蒙洞晚期、茫钲洞中期、盐洞、木龙岩厦为代表。螺壳数量仍较多,但较第三阶段有所减少;打制石器形制稳定,器型较小,磨刃石器数量较多,出现器身磨制的特征;陶器数量不多,仍以粗陶为主,部分地区出现薄胎细陶。

第五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000—4500年,遗址数量大大减少,越北山区大量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的遗址被废弃,只在局部区域还有分布,遗址密度也不高,以前枚坡文化的谅山钳村岩厦上层、明隶洞上层、同束洞上层、庄村洞上层、费点洞下层、太原刻俭洞上层,后和平文化时期的和平寨村洞、圈村岩厦、宁平媒洞中期、黄岩

厦中期、等洞、清化茫钲洞晚期、木龙岩厦、奔村岩厦,多笔文化晚期的宁平瞿洞、套洞、螺蛳洞晚期为代表。除淡水贝类外,在沿海地区洞穴也开始出现咸水贝类;石器以通体磨光的小型斧、镑为主;陶器数量不多。

第六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4500—3000年,越北山区腹地的遗址数量大大减少,贝丘遗址更少见,但沿海地区新出现一些以咸水贝类为主的遗址,以下龙文化晚期的广宁拜子龙洞、贞女洞、推孺洞上层,长泾类型的蒲转洞,枚坡文化的谅山枚坡洞、修淋洞、费点洞上层,河江文化的宣光费扞洞、河江磊能洞上层,蛮泊类型的宁平黄岩厦晚期、媒洞晚期、佛洞,泡卓文化的广平鸣琴洞、栏洞为代表。淡水、咸水贝类数量均不少;石器与此前相差不大,有肩和有肩有段石器数量较多;陶器各地相差较大,越北山区陶器不发达,北中部沿海地区陶器与露天贝丘遗址一样较为发达。

(二) 河岸型

仅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和晚期前段出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距今7000—6000年,仅见于清化沿海,以多笔文化早期的清化多笔、古驭洲下层为代表。多为河湖中的淡水贝类,数量巨大;打制石器数量较多,石器粗大,也有通体磨光的石器;陶器粗厚,数量不多。

第二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距今6000—5000年,范围扩大到义安沿海,以多笔文化中期的清化古驭洲上层、板水和晚期的穷村为代表。主要为各种淡水贝类,也有咸水贝类;粗大打制石器数量减少较多,通体磨光石器逐渐占据主要地位;陶器数量增多,器型简单,制作仍较粗糙。

(三) 海滨型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000—4500年,见于北中部义安、广南沿海,以琼文文化的义安

琼文、地洲下层、渗洲、腊北丘、地洲上层、河静派南洲，泡愈类型的广南泡愈遗址为代表。贝类数量巨大，以海中贝类为主；石器仍以大型打制石器为主，通体磨光石器数量也不少；陶器数量不多，只见于琼文文化，器型简单，制作仍较粗糙，以器形较大的双面刷纹尖底器最具特色。

第二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4500—3000年，范围向南、北扩大，从东北到中部沿海均有发现，以下龙文化晚期的广宁巴泳、二岛一姑仙、海防臼沼、罢变，长泾类型的广宁头林下层、海防长泾下层，蛮泊类型的宁平蛮泊，泡卓文化的义安石林、石落、年洲、广平泡卓，洲村文化的庆和洲村、文四东、和由5A、平巴为代表。均为海生咸水贝类，各文化数量多寡不一，北部数量不多，下龙文化数十处遗址中只有几处有少量发现，而北中部至中部的泡卓文化、洲村文化有些遗址贝类数量仍很巨大；石器以制作精致、器型规整的小型石器为主；陶器较为发达，与这一时期总体发展程度相一致。

三、广西和越南贝丘遗址的异同及成因

广西与越南的贝丘遗址之间，既有较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相异之处。李珍等对两地贝丘遗址做过初步对比，认为二者河岸型比较接近，海滨型则基本相似，广西贝丘文化对越南贝丘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⑦。这一结论揭示了二者存在的密切关系，不过是否存在贝丘文化从广西向越南的传播还需要具体分析，有些相似因素是文化交流导致的，也有不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相似造成的。本文从演进过程、生业模式和丧葬习俗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对其异同之处形成的原因也略作分析。

（一）演进过程的异同及成因

广西和越南洞穴型数量均较多，演进过程大体相似：都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中石器时代快速发展起来，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达到顶峰，新石器时代中期转为衰落，新石器时代晚期只在局部区域分布，在青铜时代完全消失。不同

之处在于，广西洞穴型有北早南晚的分布差异，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只见于桂东北、桂中，桂南则为旷野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桂东北、桂中洞穴型基本消失，桂南则在此前没有人类遗存的少量洞穴中出现，年代与桂东北和桂中有缺环，文化特征也有较大差异，彼此没有直接传承关系。越南洞穴型的分布区域则从早到晚没有太大变化，基本位于环红河平原的北部山区，少量延伸到北中部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数量很少，新石器时代以后大量发现，而且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早期，不少洞穴连续使用多个时期，文化特征也有明显的延续性。

二者洞穴型演变过程的基本同步与大体相似的环境变迁有关。更新世末次冰期对全球气候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距今20000年左右的末次冰盛期对华南和东南亚大陆生态环境的影响尤为显著，动植物种类均发生明显改变，气候变冷使得大量喜暖怕冷的热带动物灭绝或南迁^⑧。肉食来源急剧减少，食物短缺迫使人类不得不开始食用贝类等热量少而费力多的低等级食物，导致贝丘遗址开始出现。同时海平面下降了100多米，北部湾浅海地区完全成陆，分布在下龙湾一带的推孺类型的自然环境与内陆山区相同，均为森林环境的山间盆地。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气候逐渐从干冷向暖湿转变，对人类的生存空间、生业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深刻影响。新石器时代早期除少量旷野遗址外，绝大多数为洞穴和岩厦遗址，这是由于降水量的增多迫使人类从潮湿的旷野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干燥洞穴和岩厦。林木茂盛、溪流密布的常绿森林环境对动植物的生长极为有利，种类和数量都十分丰富，特别是淡水鱼类和螺贝类数量大增，使人类的生业模式从简单的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发达的广谱性采集、狩猎、捕捞经济，洞穴型数量大大增加。全新世中期，气温一路攀升并达到全新世最高值，进入最为湿热的大暖期，植被以高大乔木覆盖的常绿阔叶森林环境为主。距今约7000年以后的高温期雨量增加，洞穴中的湿度增大，洞中缺风，空气也

不易流动,湿气更难排除,且易于漏雨,地下水位上升使地面更潮湿,洞穴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只好外迁至旷野^⑨。此外,气温升高也使旷野变得宜居,洞穴居民逐渐从石灰岩山区迁居到河湖周边或海边,桂林甑皮岩、柳州白莲洞等使用长达两三万年的洞穴都在此时被废弃,越南北部的和平文化也于此时结束,洞穴型趋于衰落。全新世晚期以后,虽然华南和东南亚大陆重新转变为干旱寒冷的气候环境,但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大加强,无需回到洞穴生活。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口的激增使长江中下游的人群大规模呈波浪形向华南和东南亚地区持续迁徙,约5000年前将稻作农业传入桂东、粤西和粤北一带,并一直向南传播到东南亚^⑩。农业经济模式取代了狩猎采集经济模式,采集贝类的行为只在局部偏僻山区尚有残余,直至青铜时代最后消失。

二者不同之处与环境差异有关。广西各地均有大量岩溶洞穴存在,洞穴型分布地域较广,北部和中部为亚热带气候,南部为热带气候。在末次冰盛期时桂东北、桂中的气候更为干冷,由于尚未具备建筑保暖效果较好的房屋的知识,只能委身洞穴逃避严寒。桂南地区因为纬度较低,气温下降也不至于使人难以忍受,仍有不少旷野遗址存在,如距今40000—14000年的南宁虎头岭和小崩山遗址都位于右江河岸阶地上^⑪。越南洞穴型集中分布在越北山区,为典型热带气候,距今30000—11000年的山韦文化绝大多数为旷野遗址,说明旷野仍然适合人类生存。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雨水增多,桂南和越北的旷野居民也不得不生活在食物来源局限性较强的洞穴。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气候转为暖湿,洞穴不如旷野适宜人居,洞穴居民纷纷迁居食物来源更为丰富的河湖区域,桂东北洞穴型基本绝迹,桂中也只在个别区域发现。而桂南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出现少量洞穴型,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逐渐干冷有关,洞穴又变得适宜人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洞穴型与河岸型在同一区域内交错分布,说明他们并非完全的

洞穴居民,而可能同时使用洞穴型与河岸型。越北山区范围狭小,但洞穴居民密度很高,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虽然大部分人类迁居到食物来源更丰富、居住环境更适宜的旷野,但仍有少部分并未离开洞穴,而是适应了相对炎热潮湿的洞穴环境。泰国北部高地的洞穴遗址纬度较越北山区更靠南,气候更为炎热,公元前5500—前3500年Steep Cliff洞的人类在全新世大暖期的高温环境中生活了2000年,说明这里的湿热环境并未使人难以忍受,这可能与热带森林高大乔木树冠对湿热环境的隔绝作用有关^⑫。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越北山区的洞穴居民将农业经济与狩猎采集经济结合起来,一直延续到农业经济取代狩猎采集经济才完全从洞穴迁居旷野。

二者河岸型均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但广西数量远多于越南,而且出现时间更早,结束时间更晚,延续时间长于越南。二者同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显然与全新世大暖期的湿热环境有关,在水流缓慢的河流中有大量淡水贝类,为人类提供了易于获取的充足食物来源,不少遗址贝类堆积厚达三五米。从洞穴中走出的人类在河岸建立聚落,与其洞居祖先一样仍有采食贝类的传统。但二者的差异显然远大于其相似之处,其原因与二者的生态环境不同有直接关系。广西河岸型数量较多的原因在于,邕江及其上游的左江、右江和下游的郁江、浔江等均位于面积广大的广西盆地中央,遗址一般前临江后靠山,地势平缓开阔,水流缓慢,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适宜人类栖居,因此人类较早就开始离开洞穴进入旷野生活。而全新世大暖期的湿热环境为河中贝类的繁殖和生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贝类采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方式。由于食物来源的丰富,狩猎采集在这些区域也延续到较晚时期。虽然距今5000年以后,农业经济已成为广西各地普遍采用的生业方式,但在相对偏僻的左江流域仍然维持着狩猎采集经济,直到距今4000年以后才消失。越南虽然河流众多,但中上游都流经山区,水势湍急,河岸生态环境并不适合人类生存,下游

为沙积平原,基本是全新世晚期海退以后逐渐形成的,因此只在马江下游的多笔文化中有4处河岸型,但由于距海不远,海拔较低,在全新世海侵时被迫放弃,故而结束时间较早。

二者海滨型均位于南海沿岸,但相同之处甚少,与生态环境的不同有关。广西海滨型大多位于高出海平面10米左右的海边土丘,应是全新世大暖期时内陆居民被浅海中的丰富食物吸引而来形成的聚落。但其维持的时间不长,中全新世在北部湾广西沿海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海侵,海岸线推至现今海面高程6米左右的位置^⑩,这些聚落因此被放弃。大多数海滨贝丘遗址位于孤山或山坡处,海岸线较为平直,海湾、岛屿较少,在全新世晚期海平面频繁波动的情况下不利于浅海水生动植物的生长,更靠内陆的区域也多为丘陵山地,因此食物来源相对有限,没有适合渔猎采集的生态环境,沿海居民被迫离开海滨退回到内陆生活。越南海滨型是在海侵发生后出现的,东北部沿海的下龙湾一带虽与广西沿海相邻,但近海岛屿众多,有效阻挡了海平面波动对海岸的冲击,降低了环境变迁对人类居住环境和浅海动植物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北中部和中部沿海区域则多为沙积平原或地势平缓的低地,在纵深数十千米的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基本一致,因此沿海居民可以随着海进和海退的进程迁移居所,无需改变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受海平面升降的影响较小,延续了较长时期。不同时期的遗址距海差异较大,年代较早的琼文文化遗址距海较远,从两三千米到十几千米,年代较晚的下龙文化、长泾类型、洲村文化等位于海岸线附近或海岛上。

(二) 生业模式的异同及成因

二者洞穴型生业模式大致相似,这与类似的生态环境有关。自然环境一般为石灰岩孤山林立的岩溶盆地或谷地,气候温暖湿润,森林、溪流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而分散。人类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能够获取充足的天然食物,过着相当稳定的定居生活,不少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延

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其生业模式为广谱狩猎、采集、捕捞的经济方式。为适应这种食物来源多样化的广谱经济方式,打制的砾石石器形制多样化,功能更为细化,而且还出现穿孔石器和蚌器、磨刃石斧和锛一类更高效的工具。不同之处在于,广西气候较越南更为干凉,特别是桂东北和桂中位于亚热带气候带,动植物资源显然不如越南丰富,因此洞穴型数量和密度都远不及越北山区,大部分遗址为分散分布,只在桂林谷地较为集中,但也不及和平文化、北山文化密集成群的分布特征。而且,广西洞穴遗址贝类堆积数量不及越南丰富,贝类只是作为次要的辅助食物来源,但越北和平文化、北山文化遗址有大量贝类堆积,有的遗址螺壳占据文化层的绝大多数,这与其位置靠南、气温较高利于软体动物的生存有关,虽然不是最佳的食物来源,但数量丰富且易于捕捞的特点使其成为当地重要的食物来源。此外,桂东北、桂中较早出现陶器,并有较多铲形器、蚌刀、矛形器等生产工具,说明其强化了食物来源的多样性,以便从食物中获取更多的营养和能量,并提高取食的效率,原因在于其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⑪。而桂南和越南气候更为暖湿,资源丰富,无需采集数量虽多但加工复杂的种子类食物,没有使用陶器的迫切需求,和平文化、北山文化直到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都很少发现陶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农业经济在两地洞穴型占据主要地位,狩猎采集作为食物补充方式而存在,贝类数量不多。

二者河岸型都为采集、渔猎、捕捞为主的生业模式,捕捞水产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贝类、鱼骨数量多,堆积一般厚1米以上,有的达3、5米。但二者食物来源却各有侧重。广西河岸型多位于前临河后靠山的平敞旷野,生态系统复杂,动植物多样性较强,食物来源更为多样化,总体来看是以采集植物性食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从第一阶段顶蛳山文化中大量磨制石斧、石锛和蚌刀等伐木、收割工具来看,采集植物性食物应该占有主要地位,而动物性食物来源中

狩猎、渔猎和捕捞方式三重并举^⑤。第二阶段冲塘—河村类型打制砾石石器占大多数,加工果核和植物种子类的研磨器数量不少,磨制石器和陶器数量极少,显然采集也是主要的取食方式,这与周边地区已进入农业经济的生业模式相比显得尤为不同。另外从人骨微量元素Sr含量也可推知,当时食物可能以野生植物为主、动物为辅^⑥。越南河岸型位于沿海平原腹地,生物多样性远不如广西盆地,但这一带河湖密布,热带气候对水生动物的生产极为有利,并且随着气候从温暖向炎热发展和海平面逐渐上升,生态环境从陆地环境向海、陆混合环境变迁,除淡水生物外还有咸水生物,因此多笔文化的生业模式是以捕捞水产为主,有的遗址螺壳堆积很厚,显然各类淡水和咸水贝类水产品在水食物构成中占主要部分。动物骨骼中鱼骨数量占有绝对多数,多为小鱼,小型网坠数量也不少,说明近海捕鱼是重要的经济活动。狩猎和采集也占一定比例,可能有狗、牛和猪的驯养。

二者海滨型年代早晚、延续时间长短都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不多。广西海滨型都处于沿海地带的山岗或小岛上,且附近有淡水小河入海^⑦,遗址前临海后靠山,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水生和陆生动物资源丰富,为狩猎、采集和渔捞并举的生业模式。贝类捕捞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石器以带尖状和厚刃的大型打制石器为主,出土了大量可能用于采集附着在礁石上的贝类的螯蛎啄。大型石网坠和大型鱼骨的出土说明捕鱼也是重要的经济活动。磨制石器和骨蚌器不多,显示出采集可能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高。越南海滨型分布地域广、延续时间长,各区域、各时期生业模式有一定区别。越北的丐萍类型和下龙文化遗址位于海湾或海岛上,经济形态以捕捞海鱼为主,只有少量遗址将贝类作为辅助食物,而且数量不多,在水食物构成中所占比例很小。长泾类型均为玉石器作坊遗址,生业模式具有明显的商业特色,制作玉石器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换,贝类捕捞也只是辅助食物而已。蛮泊类型延续时间

较长,早期海平面较高,海水将遗址周边淹没,经济方式以捕捞、狩猎和采集为主,海产品不多;中期以开发海产品为主,主要捕捞各种贝类,数量极多;晚期海退使遗址成为内陆环境,海产品逐渐减少,经济方式以种植块根植物和畜养为主,还有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工具较多。琼文文化地处全新世海进时期形成的浅海湾——古琼疏湾周边的沙洲上,在全新世中期海平面较高且持续波动的情况下,其他区域尚未形成有利于海中贝类生长的自然环境,本区域地处相对平静海湾的独特生态环境利于浅海水生生物的生长。其经济形态以捕捞海产品为主,海生贝类在水食物结构中比例较高,有专门用于炊煮各类贝类和海产品的大型尖底陶器。泡卓文化农业经济已成为主要生业模式,但渔猎和捕捞海中鱼类、贝类仍在部分遗址的水食物构成中占重要部分,贝类堆积厚达3、5米,而同时期相邻的其他遗址却没有任何贝类遗存发现,说明不同聚落的人群对食物的喜好不同。泡愈类型经济形态以捕捞海产品特别是扇贝为主,这种长期稳定而简单的生业模式使其文化即使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和平文化传统。洲村文化年代已晚至青铜时代早期,但其经济形态仍以狩猎和捕捞海产品为主,迥异于与其相邻的时代相同、环境相似但经济形态以农业种植为主的隆盛类型,显然与不同人群的自主选择有关。

(三) 丧葬习俗的异同及成因

两地贝丘遗址中不仅有大量的食物遗存,还普遍发现墓葬和古人类遗骸。从两地丧葬习俗来看,相似之处颇多。两地各种类型的墓葬葬式都以四肢卷曲厉害的屈肢葬占绝大多数,广西部分河岸型贝丘遗址中的所谓肢解葬据研究可能只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屈肢葬^⑧,此外两地都有的蹲踞葬也应是屈肢葬的一种形式。这种屈曲很甚的屈肢葬在国内被纳入南方传统的华南支系^⑨,实际上基本位于广西,广东仅在高要蚬壳洲和遂溪鲤鱼墩发现,蚬壳洲位于粤西西江沿岸,鲤鱼墩位于北部湾沿岸,应该是从广西和越

南北部传入的。此外,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横县西津、邕宁长塘和越南和平文化、多笔文化、下龙文化、泡卓文化等有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的做法。从分布地域来看,二者属连续分布,文化相似性也较多,可以纳入同一文化圈。这种葬俗的相似可能与文化传播和人类迁徙都有关系,广西屈肢葬呈现出北早南晚的特点,文化特征也具有明显的相似和传承性,桂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屈肢葬是“甑皮岩”人南迁或受其影响而出现的^⑩,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的做法也基本一致。越南屈肢葬俗早于广西,山韦文化开始出现,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的做法始于和平文化,都是同源发展而来的。而岭南受山韦文化的影响可能性更大,山韦文化的分布范围北部到达岭南^⑪。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认为,现代东亚人是自非洲经东南亚迁徙而来并替代原始土著后形成的,而非在原有古人类基础上进化而来,东亚N系人群在5.3万年前到达北部湾地区,其最初的扩张范围和规模非常有限,2.5万—2万年前出现大规模扩张,快速扩张到华中地区,部分支系深入华北和东北地区^⑫。或许是人类的大规模迁移,使山韦文化的石器工业技术在岭南得以广泛分布,特别是在从越北到桂东北的迁徙路线上的文化相似性更强,广西屈肢葬葬俗的出现可能与山韦文化的北传有关。此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越南北部人类体质特征从澳大利亚人种逐渐向蒙古人种转变,与华南史前人类持续南迁至越南有关^⑬。随着相互往来和人群迁徙的发展,两地出现较多相似的文化特征,屈肢葬及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的葬俗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顶蛳山文化和多笔文化陶器的相似也可能与之相关。

不过,与广西千篇一律的屈肢葬不同的是,越南还有仰身直肢葬与屈肢葬共存,虽然数量不多,但从和平文化开始一直都存在,越往后数量越多,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已经取代屈肢葬成为主要葬式,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青铜时代的仰身直肢葬的出现或许也受到越南史前文化的一定影响。此外,越南洞穴型如和平文化、北山文

化、枚坡文化等部分墓葬用石块围砌墓边的做法也不见于广西。

(四) 小结

从演进过程、生业模式、丧葬习俗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广西和越南的史前贝丘遗址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也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其成因既与生态环境有关,也与文化交流和人口迁移有关。

注 释:

① 蒋廷瑜:《广西贝丘遗址的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韦军:《桂林谷地史前洞穴遗址的分布及其认识》,《史前研究》,2001年。

③ 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编著:《柳州白莲洞》,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220页。

④ 何乃汉:《广西贝丘遗址初探》,《考古》1984年第11期。

⑤ 韦军:《桂林谷地史前洞穴遗址的分布及其认识》,《史前研究》,2001年。

⑥ 除单独注明外,本文越南考古资料均采自拙著的相关内容(彭长林:《越南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⑦ 李珍、黄云忠:《中国广西与越南的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关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⑧ Hà Văn Tấn. The Late Pleistocene climate in the Southeast Asia: New data from Vietnam. *Modern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Vol.9, pp.81-86, 1985.

⑨ 周昆叔:《环境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⑩ 张弛、洪晓纯:《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⑪ 黄云忠:《南宁市打制石器的发现与研究》,《邕州考古》,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⑫ [新西兰]查尔斯·海厄姆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译:《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58~62页。

⑬ 谢复飘:《北部湾广西海岸第四纪岸线变迁》,《技术与市场》2013年第3期。

⑭ 陈伟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⑮ 吕鹏:《广西邕江流域贝丘遗址动物群研究》,《第四纪研究》2011年第4期。

(下转第97页)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Vol.9, pp.81-86, 1985.

②① HOÀNG XUÂN CHINH.Nhóm di tích Nậm Tun) - Bản Phố (Site group at Nậm Tun-Bản Phố). *Khảo cổ học*, số 2, pp.31-36, 1979.

②② NGUYỄN GIA ĐỐI .Di chỉ Mái Đá Điều và một số vấn đề thời đại đá miền Tây Thanh Hoá (Điều Rockshelter and some Stone Age problem in western Thanh Hoá) . Luận án tiến sĩ Lịch sử, Hanoi, 2001.

②③ LÊ TRUNG KHÁ ,VŨ THẾ LONG.Mười năm nghiên cứu hoá thạch người và động vật cổ. (10-year research on human and animal fossils) . *Khảo cổ học*, số 18, pp.9-16, 1976.

②④ PRAEHISTORICA ASIAE ARIENTALLS. Procès-verbal des séances et réunion, 1932, pp.3-15.

②⑤ HOÀNG XUÂN CHINH (ED.) . Văn hoá Hoà Bình ở Việt Nam (Hoà Bình culture in Việt Nam) . Nxb.Khoa học Xã hội, Hanoi, 1989.

②⑥ MANSUY H..Station préhistorique dans les caverns du massif calcaire de Bac son (Tonkin) , *MSGI*, Vol.11, fasc.2, 1924; MANSUY H. COLANI M..Néolithique inférieur (Bacsonnien)Ethiopia néolithique supérieur dans le Haut-Tonkin (dernières recherches) avec les crânes du gisement de Lang Cuom. *MSGI*, Vol.12, fasc.3, 1925.

②⑦ HÀ HỮU NGÀ.Văn hoá Bắc Sơn.Khoa học Xã hội, Hanoi, 2001.

②⑧ NGUYỄN KHẮC SỬ .Prehistoric Culture in limestone Caves and Shelter in North Vietnam. *Vietnam social sciences*, Vol.1, No.111, pp.89-102, 2006.

②⑨ BÙI VINH.Đa Bút -Văn hoá và văn minh (Đa Bút-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 *Khảo cổ học*, số 3, pp.15-31, 1987.

③① NGUYỄN TRUNG CHIẾN.Văn hoá Quỳnh Văn (Quỳnh Văn Culture) . Khoa học Xã hội, Hanoi, 1998.

③② COLANI M.Découvert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es parages de la Baie d'Along,Institut Indochinois pour l' Etude de l' Homme, Hanoi, 1938, pp.93-96.

③③ NGUYỄN KHẮC SỬ.Di chỉ Cái Bèo với tiền sử vùng ven biển Đông Bắc Việt Nam (Cái Bèo site and coastal prehistory in northeastern Việt Nam) . *Khảo cổ học*, số 2, pp.17-26, 1986.

③④ HÀ VĂN TẤN,BÙI VINH,VÕ QUÝ.Những dấu hiệu về một nền văn hoá mới ở Hà Tuyên (Traces of a new culture in Hà Tuyên) . *Khảo cổ học*, số 1-2, pp.34-38, 1990; NGUYỄN KHẮC SỬ et al. *Hà Giang thời tiền sử* (Prehistory in Hà Giang) . Khoa học Xã hội, Hanoi. 2000, pp.182.

③⑤ HÀ HỮU NGÀ,NGUYỄN VĂN HẢO .Hạ Long thời tiền sử (Hạ Long in Prehistory) . *Thế Giới*, Hanoi, 1998; NGUYỄN KHẮC SỬ (ED.) .Khảo cổ học vùng duyên hải Đông Bắc Việt Nam (Coastal archaeology in northeastern Việt Nam) . Khoa học Xã hội, Hanoi, 2005.

③⑥ HÀ VĂN TẤN .Từ Bàu Tró đến Sa Huỳnh (From Bàu Tró to Sa Huỳnh) . *Những phát hiện mới về Khảo cổ học năm 1982*, pp.142-144, 1983; LÊ ĐÌNH PHÚC.Tiền sử Quảng Bình (Prehistory in Quảng Bình) . Khoa học Xã hội, 1998, Hanoi; PHẠM THỊ NINH.Văn hoá Bàu Tró (Bàu Tró Culture)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0, Hanoi.

③⑦ NGUYỄN KHẮC SỬ .La culture de Bien Ho au Tay Nguyen, *Etudes Vietnamiennes*, Vol.2, pp.49-64, 1996.

③⑧ NGUYỄN KHẮC SỬ .Khảo cổ học tiền sử Tây Nguyên,những nhận thức mới (Tây Nguyên prehistory, New perception) , *Khảo cổ học*, số 1-2007, No.145, pp.5-14, 2007.

(责任编辑: 赵 蕾)

(上接第86页)

①⑥ 魏博源、朱文、钟耳顺等:《广西崇左县冲塘新石器时代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①⑦ 吴付平:《广西北部湾地区贝丘遗址的分布与认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①⑧ 覃芳:《广西邕宁顶蛳山史前屈肢葬与肢解葬的考察》,《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①⑨ 韩建业:《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文物》2006年第1期。

②① 漆招进:《“甌皮岩”人葬俗及其与岭南其他人类的关系》,蒋炳钊主编:《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

学会第十二次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② Tring Năng Chung. *Mối quan hệ văn hóa thời tiền sử giữa bắc Việt Nam và nam Trung Quốc*,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9, pp.127-129.

②③ 陈致勇:《东亚人群线粒体N系单倍群的迁徙分化》,《现代人类学通讯》2009年第3卷。

②④ 彭长林、韦江:《现代越族形成的早期过程探研》,《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 赵 蕾)